

徐森玉佚文《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新考

□ 法宗 中国佛学院
□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4年3月创办的《图书季刊》，历经抗战时的艰难困苦，编印出版辗转上海、昆明、重庆、北平，到1948年14年间，共计出版12卷共34期，“是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较久、出版期数较多的图书馆馆刊”，而且在“保存了很多重要的中外学术史和出版史资料”“推动学术研究提升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学术地位”“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等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①。在1934年3月第1期创刊号《新书介绍》栏目中，以笔名“露”发表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以下简称《过类疏》），介绍吴兴徐氏影印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虽仅千余字，但在《赵城金藏》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堪称第一篇研究《赵城金藏》的学术论文^②。经我们考证，此文当为徐森玉先生所撰。本文即就此进行考证，并论述《过类疏》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过类疏》作者考

众所周知，《赵城金藏》发现后，当时影印宋版藏经会仿真影印了《首楞严经》十卷，蒋维乔撰《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记载：“《赵城藏》中《楞严经》十卷，幸首尾完整，与通行本校勘异同，计得一百数十字。特照原经影印四百部，仍装为卷轴式，用红木圆轴粘卷，竹签绾束，流通中外，俾知《赵城藏》之真相。”该卷由影印宋版藏经会制作，黄卷赤轴，纸质、纸色如不细看，颇能冒充《赵城金藏》原件，至今不少收藏单位依然待之以真品。实际上，原件十卷现仍存国家图书馆。^③同一时期还仿真影印过《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至于由谁制作、什么时间制作则成为历史公案。特别是此后《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原卷一度佚失，不知下落，任继愈先生主持影印的《中华大藏经》不得已以这部仿真本复制印刷的。^④

^① 张敏：《〈图书季刊〉的创刊及其历史意义》，《新世纪图书馆》2016年第9期，第61—65页。

^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蒋唯心1934年12月发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是第一篇研究《赵城金藏》的学术论文，见杨学勇《九十年来〈赵城金藏〉雕印研究史述评》，洪修平主编《佛教文化研究》第八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45页。

^③ 李际宁：《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下），《藏书家》第16辑，齐鲁书社，2009年，第100页。

^④ 范成：《宋藏遗珍》序，《宋藏遗珍》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8页。

2010年,方自金、马学良等最先揭示山西省博物院和河北大学图书馆均藏有卷轴装《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并指出两者版本上存在细微差别,并认为两家必有一家为30年代的仿真品^①。2014年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期间,专家们在河北大学图书馆申报的资料中,发现《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经过方广锠等先生鉴定,此为《赵城金藏》原件^②,2016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是李际宁提出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仿真本由谁制作、什么时间影印的历史公案并未告落,《图书季刊》本则新书介绍《过类疏》则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公案。印制时间至迟当在《过类疏》公开发表的1934年3月,影印者是吴兴徐氏。吴兴徐氏是谁呢?古籍馆同事赵爱学博士告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附录三《捐书人名录》记载“徐鸿宝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二卷;唯识三十论略解一册”^③、日本昭和九年(1934)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记载:“四五六八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唐释窥基撰民国二十三年吴兴徐氏用金刊藏经本景印徐森玉先生捐”^④,说明影印出版者吴兴徐氏可能就是徐森玉先生,他“依原式”影印出版后曾广泛赠送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等机构。

徐森玉先生(1881—1971),名鸿宝,以字行,浙江吴兴菱湖镇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佛教学者、文物鉴定专家。据柳向春《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徐森玉在1921年与韩德清、朱芾煌等共同发起法相研究会,1922年襄助日本编纂《大正藏》,1923年与梁启超、蒋维乔等64人具名发起影印日本《弘续藏》,1924年助印玄奘译《天请问经》(附疏),1925年10月参加太虚大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第二次大会,1926年9月担任中日佛教联络员。1927年1月具名呈报申请组织三时学会,并常住三时学会,公余之暇,研习佛典,1930年4月捐资10元助三时学会刊印玄奘所译的《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⑤1933年夏,范成在赵城广胜寺发现这部古本大藏非常罕见,“其中为各藏所无之经典,竟有四十六种二百四十九卷之多。因函电报告沪上影印宋版碛砂藏经会诸君及北京三时学会徐森玉居士。^⑥”1933年8月9日至28日^⑦,在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身兼要职的徐森玉不惮炎暑,由北平乘车赶赴广胜寺,主持选择、借印之事^⑧。在范成法师的协助下,

^① 方自金、马学良、张克清:《〈赵城金藏〉发现始末及其版本问题》,《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12期,第101页。

^② 李际宁:《“巨籍巍然,重兴于世”——〈赵城金藏〉的出版》,《光明日报》2017年02月23日05版。

^③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附录三《捐书人名录》,第16页。

^④ 日本昭和九年七月初订《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第68页。编目者仍遵从原卷题名,著录编者为“窥基”,没有采用“过类疏”考证的作者“文轨”。

^⑤ 柳向春:《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收录柳向春编《徐森玉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5—275页。

^⑥ 范成:《宋藏遗珍》序,《宋藏遗珍》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8页。

^⑦ 据《北平晚报》1933年8月10日《徐鸿宝赴晋》报道:“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徐鸿宝,昨日由平前往山西,任务不明。”《北平晚报》1933年8月29日《徐鸿宝由洪洞县返平拟辞故宫博物院兼职》报道:“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代秘书长徐鸿宝氏,已于昨日由晋南洪洞县返平,闻徐氏以北平图书馆采访组事务纷忙,拟向院方提出辞呈,专任图书馆事务云。”1933年8月31日《朱自清日记》记载,郑振铎“又谈徐森玉在山西赵城所得金刻本卷子佛经,其地有霍山,山有某寺,经即藏寺中”(《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5页)。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记载,徐森玉先生在赵城主持选择、借印,过了半个月,带回借出的数大箱未见的经卷。

^⑧ 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郑振铎全集》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5页。

徐森玉穷一日之功，确认范成法师所选的孤本秘籍，并以藏经中有金熙宗天眷年号（1138—1140），故断定为金刻本^①。经徐森玉、叶恭绰与当地士绅疏通关系，以赠送一套影印本《碛砂藏》和300元使用费，借走原卷，在北平和上海影印出版^②。徐森玉时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借到北平三时学会的经卷还在北平图书馆展出过。其中《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天圣释教总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法宝录》等四种经录，久佚于世，在佛教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徐森玉力主由北平图书馆影印。而关于法相宗者，由三时学会影印。其他运沪，由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③这样北平图书馆成为影印《宋藏遗珍》的发起单位，袁同礼副馆长与朱庆澜等共同署名《发行宋藏遗珍缘起》^④。后来或许由于北平图书馆缺乏经费的原因，只有北京三时学会和影印宋版藏经会实际参与《宋藏遗珍》的影印^⑤。综合以上所述，徐森玉受母亲闵氏家族世代以刊刻书籍为业的影响，时常帮助或资助佛经的出版，特别是积极推动《宋藏遗珍》的出版，因而由“法相宗的信徒”^⑥徐森玉影印出版《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并分赠学术界和收藏机构，应该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以笔名“露”在北平图书馆创办的《图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富含学术价值的《过类疏》，最有可能是北平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佛教学者徐森玉为自己影印出版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撰写的“新书介绍”。

^① 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第456页。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记载“闻寺中昔有天眷二年印本法华经第七卷，系洪洞观音院旧物（日人桥川时雄曾见之于某处）。惜余未见此本，不知版式何若。其大藏经中法华经则七卷全存，第七卷末跋乙亥，为贞元三年，与天眷印本各异，固不可相混也。”（见《金藏雕印始末考》，支那内学院，1935年，第18页）。李富华在《〈赵城金藏〉研究》中认为《赵城金藏》刻经最早年代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见“鸣”帙《妙法莲华经》卷3、卷5、卷6、卷7。这4卷经现存上海图书馆（见李富华主编《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第307页），何梅于2005年、2006年两度到上海图书馆实地查阅原卷，认为上海图书馆所藏4卷《法华经》是金天眷二年由晋南洪洞县卫家经坊印造的，且无千字文帙号，并非大藏经本（见何梅：《〈赵城金藏〉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3期，第31—32页）。

^② 关于徐森玉与广胜寺商借《金藏》记载颇多，新近发现《京报》1933年9月3日《日人以为我国已失传之金版佛经法相犹在晋省 徐鸿宝前赴赵城县广胜寺代表宋版藏经会商借影印》记载详细，颇为珍贵，兹全文逐录如下：“故宫博物院秘书徐鸿宝，此次赴晋原因，系受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僧人范成委托，前往晋省赵城县广胜寺，接洽借印金版藏经。广胜寺藏经甚夥，而金版藏经，尤为海内孤本。内有多种，可补碛砂本之缺，徐氏与广胜寺住持僧人悟慧，本为旧雨，故此次接洽，极为圆满。由徐氏担保，将金版藏经若干卷，借与影印宋版藏经会，摄影付印，以三月为期。由该会捐助广胜寺建筑口费三百元，并赠与影印宋版藏经全部。倘所借经卷，发现有缺少损害，及更换情事，均由徐氏负责。双方将条件接洽妥贴，即行签订合同，闻广胜寺藏经之富，为国内所鲜见，珍本中有‘大唐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两者实为《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天圣释教总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法宝录’等。但徐在该寺，已发现经内法相（应该法相宗典籍的简称）。此种法相，向为日人诩为中国自宋代后，已经绝迹者，不图广胜寺中全部存在，亦足征徐氏发现之伟大。可谓不虚此行云。”

^③ 《山西广胜寺发现宋藏经》，《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年第2卷第5期，第31页。

^④ 《发行宋藏遗珍缘起》，《海潮音》1935年第16卷第1期。

^⑤ 《广胜寺金刊藏经之影印》，《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6—17页。

^⑥ 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46—463页。

二、《过类疏》的学术史价值

《过类疏》的学术史价值有三：首先徐森玉先生最早提出赵城广胜寺所藏藏经为“金刻藏经”，见前文及注¹²所述。尽管其所立论的根据是金天眷年间刊刻的《妙法莲华经》，后来经何梅论证该经乃由晋南洪洞县卫家经坊印造，没有千字文帙号，绝非《赵城金藏》本，不能作为《赵城金藏》断代的依据，但是徐森玉先生当时提出的“金刻藏经”说，推动了《赵城金藏》刊刻年代的继续深入研究。1933年夏，范成法师为访求影印《碛砂藏》的配补本，在赵城广胜寺发现古本大藏经，按照北宋王古所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核对整理，“分别部居，粗得其所”，并四处访求流散的经卷，出资购买了三百多卷，经其收集整理，广胜寺共存经书4975卷。然而他没有深入研究，因而在1934年4月致太虚法师的信中，甚至认为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施资所刻藏经，因此李际宁认为“从文物角度讲，范成可称之为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①。《过类疏》发表半年之后，蒋唯心受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委派，前去广胜寺调查40余日，于1934年12月在南京《国风》第五卷十二号上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1935年1月，南京支那内学院发行单行本），认为“此经原刻自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约三十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②”进一步印证了赵城藏为“金刻藏经”。随着国家图书馆藏《碛砂藏》本《大宝积经》卷29题记所引《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赵汎碑）^③，以及《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等新资料的发现^④，学者进一步认为“《赵城金藏》镌刻于金熙宗皇统九年至世宗大定十八年（1149—1178）”^⑤。

其次徐森玉先生指出此部藏经“为元代《弘法藏》之蓝本，故《至元录》载《弘法》入藏诸籍，《赵城》本几无一不具”，最先提出了《赵城金藏》与《弘法藏》版本关系的问题。据《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所载，经版最初运到大昊天寺。据赵汎撰《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所载，大定二十九年（1189）照公“闻京师弘法寺有藏教版，当往彼印之”，则移藏弘法寺的时间当在大定二十九年以前。^⑥此后蒋唯心进一步申论“岂非弘法之经版即崔氏刻藏耶？此非徒一推测已也，从藏经版本之系统言，由弘法旧版蜕化为元弘法本，现存崔藏之编制如附录简目之所列者，与元本所据之弘法旧版（见《至元录》）无不恰合。至著述之一部分名目卷帙，尤可见崔刻藏之必为旧弘法而后来元本所因以增损者”^⑦。

第三徐森玉先生经过缜密考证，认为《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并非窥基所著，而是玄奘大师另一弟子文轨所著《因明入正理论疏》之残本。同年4月，支那内学院耆宿在“过类疏”的启发下，在《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和日本《续藏经》所收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

^① 李际宁：《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上），《藏书家》第15辑，齐鲁书社，2009年，第44页。

^②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年1月，第9页。

^③ 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46—463页。

^④ 王泽庆：《〈解州版金藏〉募刻的重要文献——〈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佛学研究》2002年，第320—327页。

^⑤ 何梅：《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⑥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第14页。

^⑦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第14—15页。

第一卷基础上，勾稽善珠《明灯抄》、明诠《大疏里书》和藏俊《大疏抄》所引《文轨疏》，初步复原了《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①。

附录：

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 吴兴徐氏影印本 非卖品

山西赵城广胜寺，藏金刻藏经五千卷，为元代《弘法藏》之蓝本，故《至元录》载《弘法》入藏诸籍，赵城本几无一不具，此《因明论过类疏》即其一也。影印本依原式制版，仍作卷子形，全卷二十纸；虽微有残缺，而首尾完好。秘籍千年，睹之一旦，诚快事已。

疏本首题《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大慈恩寺沙门窥基撰，尾题又作《因明正理门论十四过类疏》。今按疏所解者，乃《因明入正理论》文末谓于圆满能立以下数行。有似能破之释文，而缺其总标，章句割裂，不似单行撰述，此殆原为《入正理论》全疏之残本，传写者不审所出，乃别加题号，且臆断为基师手笔云尔。基师于《理门》无注释，《入论》大疏亦未终篇，赖慧沼续成之，故《理门》之过类及《入论》之似破，基师均无详说，慧沼、智周诸师亦不及此。当时作家注解《入论》而博涉《过类》者，惟文轨一人耳。轨说流传日广，取以与《过类疏》相校，乃见其为同本。如过类疏解初四种相似过类及最后过类（影印本第一纸至第六纸，又第十九纸），又解论文且止斯事一句（影印本第二十纸），皆与日人善珠藏俊书中所引轨疏之文相符（见《大正藏》本藏俊《因明大疏抄》卷四十一及善珠《明灯抄》卷六末）。又《过类疏解》末段论文曰：此第三结略彰广分（影印本第二十纸），亦与轨疏大科段落全同（见《靖国续藏》本文轨《因明入正理疏》卷一）。至《过类疏解》其余过类处，今虽无轨疏勘对，然与抄集轨说之《因明入论略纂》仍一一密合（见《因明大疏抄》卷四十一）。其解犹豫相似过类，引梵本《理门论释》以通外难（影印本第十二纸），《明灯抄》固确认为轨师之言（见抄卷二末）。善珠藏俊皆亲见轨疏全本者，所引诸文当可置信，是则《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云者实即文轨《入正理论疏》之残本，应无疑也。

唐贤因明之学，惟基师独步，故其疏一出，而旧文几于全废，轨疏幸有残本流传，见者即误为基作，此犹抄集轨说之《略纂》误归于积沼，无足异也。今考日人入唐求法诸家目录，惟唐大中圆仁《新求圣教目录》始见《十四过类记》名目（《大正藏》本五十五卷），然犹不知作者谁氏（后来日人亦误为护命所作，且误入于藏俊《法相宗章疏录》内），至宋元祐中义天《海东录》卷三，乃出窥基述《正理门论过类疏》一卷（见《大正藏》本五十五卷）。是误轨疏为基著，又别题为《理门过类疏》，其始当在唐末宋初也。自元刻《弘法藏》板毁，《至元录》仅存基师此著之名，使学者渴想臆测而不能已者，既七百年。今得赵城本之印行，乃证明基师撰述《过类疏》云云全出误传，而轨师佚疏反藉以补缺，其俾益此者学匪浅鲜矣。

（露）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山西师范大学杨学勇博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赵爱学博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向辉博士，国家图书馆展览部雷强博士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① 沈剑英：《文轨及其〈因明入正理论疏〉》，《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22页。